

民俗采风

# 揉进白面里的年味儿

小非

记得周有光先生说过,中国的传统节日,人文性质的不多,除端午之外,大都与天文现象有关。不过,升斗小民是难以掰扯清楚这些的。

农耕时代,人们连最起码的口腹之欲都难满足,只能压抑旺盛的生理需求,崇尚节俭,不过,隔三岔五,总得找个借口吃点好的,打打牙祭,如此人们方能感觉些许希望,节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。

只要有点说辞,就会冒出个节日来,虽然主题大多关乎天文,但民间解读里,还是融进了许多与“吃”相关的内容,甚至喧宾夺主。

春节之外,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亦属重要节日。至于“二月二龙抬头”“七月七鹊桥会”等许多名堂,就数不胜数了。

几十年前,在北方农民的口粮中,小麦的比例很低,白面自然就很金贵。这么金贵的东西,只能留待节日享用。平日里,家家户户都是苞米面、地瓜干……

不过,农忙之时,女人们也会在豇豆面、胡黍面、地瓜面或是玉米面中掺上点白面调剂一下。杂粮粉虽然缺少面筋,但与白面揉在一起后,就能擀皮切面了。

豇豆面条擀在一大锅汤里,捞出碗干的给出力的男人后,其他人碗里也就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根了。不过,那碗面汤依然可以香香嘴,孩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许多人非常怀念那段岁月里母亲做的烂面汤,除了味蕾的因素,就有些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的意思了,实乃酸楚之事。

新麦子下来那几天,是人们热切盼望的日子。麦子粉碎罗好后,可以敞开肚皮吃顿“卷子”(馒头)。此等享受,一年只有两次,下一次就要等到过年了。

元宵汤圆,端午粽子,中秋月饼,南北皆然。其他节日,胶东一带也就是包子、饺子或者面条了。

当然,过年还是隆重了许多,一年之始,马虎不得。此时亦是农闲,时间相对充裕,尤其是北方,天寒地冻,也做不了什么,年味儿折腾得就比南方浓一些。

胶东半岛一进腊月,似乎就来到了年口。从小年开始就更忙活了,炸花鱼、炸丸子、炸面鱼,打年糕、蒸饽饽、包饺子……

渤海湾的“劳子鱼”或曰“劳板鱼”,学名“鲚鱼”,舟山一带称之为“花鱼”。奇怪的是,鲚鱼干水发后裹上白面酥炸,我们这里也说成了“花鱼”。是因年节之故要用美称,抑或是历史演变中的遗存,不得而知。

花鱼属荤菜,丸子是素的,水焯萝卜丝佐以葱姜调好味道,再用白面搅和成团油炸,亦是美味。说来说去,这两道硬菜,依然离不开白面。

鲷目鱼学名“半滑舌鲷”,广东

人称之为龙利鱼,形状扁长,肉质细嫩,品质上乘,由于获取不易,人们只得在遐想中,用醒发好的白面仿制,油炸后美其名曰:“炸面鱼”,这是过年时最受欢迎的主食。不过,老烟台人,也就是芝罘一带的原住民,却把它叫成了“草鞋底”,外观倒是挺像,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后,就不太舒服了。哪像岭南人家,明明是鸡爪子,却偏偏说成了“凤爪”。

面鱼人人爱吃,然而花生油金贵,不能管够吃,主打的还是饽饽。它与馒头的最大区别,在于多了道“饯干粉”工序。也就是说,要在发酵膨胀的面团里掺入干面粉不停地揉和,如此循环往复三四次,蒸熟后才有嚼头,撕一块扔进嘴里,特别劲道。

饽饽出屉后,花鱼和萝卜丝丸子也炸好了,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大快朵颐,生活的滋味儿就出来了。不过,饱餐一顿后,其余的都要放在院子里冻上,留待正月里慢慢享用。

蒸饽饽时,还要顺带做些巧果,把面团塞进木质模具里按紧后,倒扣出来,千姿百态的动物形象就呈现在了眼前,煞是可爱,年岁小的孩子特别喜欢。

除夕之夜,更岁交子,饺子取其谐音,子夜时分方能享用。不过,胶东亦称“箍扎”或曰“饽饽”,面皮放上馅儿后用力一捏,就箍扎在一起了。

有些会过的女人,到了这个当口,给自己箍扎的那几个饺子,还是要掺上点地瓜面或是胡黍面什么的,甚至一整年也舍不得吃顿纯白面食物。

饺子之外,要弄几个菜喝杯酒。除了花鱼、丸子,白菜粉条里或许还会有点豆腐甚或猪肉,这就很不一样了。

彼时上级号召大力养猪,几乎家家户户的圈里都供奉了“天蓬元帅”,不过,屠宰时要送到公社供销社采购站,不能随意宰杀。采购站按牌价收购后,可以留点肉给你,但要扣钱。猪头、杂碎、板油最为紧俏,是很难买到的稀罕之物。

第二天就是新的一年了,一大早还是吃饺子。勤快的女人打个盹后,现包现煮,图个新鲜;不太讲究的人家,头天晚上剩下的馊一馊,也就对付过去了。这顿饭,反倒不如除夕夜里正式。

早饭后就是拜年,五服之内的本家、村里的长者,都要走一圈,然后就是东家走,西家窜。天近晌午,就在平日里走得近的人家中坐下了。也不用太忙乎,地瓜干酒端上来,还是那几个菜。喝得差不多时,饽饽切成片馊好上桌,然后约好下一顿去谁家,这顿饭差不多就结束了。

蓬莱地界,初一在村里拜完年

后,初二要上姥娘家,初三则要去丈人家,然后就是舅家、姨家……孩子们都巴望着“出门”,待在家里,饼子、地瓜这些老一套又开始当家了。

出门大小都是客,为了那顿饽饽……孩子们宁愿跑几十里山路,虽然转回家后又是饥肠辘辘,起码中午过了嘴瘾。

出门不能空手,胳膊上拐的篓子里,依然是普通的白面制品:饽饽、面鱼、巧果。好一点的要加包桃酥,还是白面制品,只是高级了不少,六毛钱、六两粮票一斤,半斤十片,封成一长溜,两溜捆成一包。桃酥轻易不能启封,要在亲戚间倒来倒去,一直到包装纸完全被油浸透,甚至放到变质后还是舍不得吃,令人唏嘘。

吃商品粮的城里人,虽然白面的比例多了些,但苞米面、地瓜干等粗粮依然不少,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年节就是期望有好东西吃,然而那些好吃的,几乎都离不开白面,感觉整个节日都被揉在了一大堆面团之中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乡亲们的日子迅速改善。1985年麦收时节,我回了趟老家,表弟炫耀地对我说:如今日子好多了,“卷子”管够,愿哪么“逮”就哪么“逮”。

彼时北方地区商品粮供应还有粗粮,农村先行一步,一时好过城里。直到1992年10月1日开始,粮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
然而,似乎一夜之间,白面的金贵地位开始弱化,替代食物眼花缭乱,过年时饽饽、饺子虽然还是主食,已经名不副实。琳琅满目的海鲜、蛋禽及畜肉,渐渐改变了人们昔日的饮食习惯。

有人说,现在的年味儿淡了,穿新衣、吃好饭成了平常之事后,自然就缺少了新奇感。

很多年前,听过阎维文那首《中国的年》,心中有些感动,其实是喜欢里面的几句歌词:“奶奶的皱纹里,蕴藏着年的故事;妈妈的笑容里,饱含着年的祝愿;爷爷的酒壶里,盛满了年的喜悦;爸爸的目光里,诉说着年的变迁。”

上了年纪怀旧,其实反倒是图个新鲜。青砖灰瓦的老宅,院子里是拧成辫儿的苞米棒子和大蒜,墙上的干辣椒在漫天鹅毛大雪的映衬下愈发红艳……窗外天寒地冻,屋内暖意融融,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,地瓜干酒烫得热乎乎的,夹个葱姜味儿十足的白菜猪肉馅儿饺子,还要蘸上口蒜泥儿,掰一块饽饽扔到嘴里,嚼得腮帮子都累得慌……

不过,这只是脑海中的一幅图景罢了。人们真正眷恋的,无非还是一家老小凑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就像一堆白面,揉成面团儿后,就难以分开了。

## 挂红

林红宾

苏家店镇位于栖霞市西北部,西接龙口,东临蓬莱,其东北面石峰突兀,是小有名气的自然风景保护区,内中有一小石山,名曰“三县顶”,意为三县所共有。当年我得便就到那几个村里采访,对那里的民俗风情、逸闻趣事烂熟于心,犹记得一种“挂红”风俗别有情趣,寓意时来运转,日子红红火火。

山里生活平静如水,唯有男娶女嫁、生儿育女,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。大家循规蹈矩,备礼份行人情,主人自会设宴款待,宾客欢聚一堂,放量畅饮,好不痛快!鉴于这个缘故,村民们对于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活动格外关注。这不,杨守泉的媳妇就要临盆了。那些在街头的婆娘说,他媳妇腰板显粗,臀部不大,保准生个女孩。当晚,杨守泉的媳妇分娩,果然是个女孩。杨守泉正盼望着生个女儿,眼下如愿以偿,高兴得不得了。天刚放亮,杨守泉打开街门,不由得一愣,门楼上垂下一块红布,是谁消息这么灵通,一早前来“挂红”?出去一看,竟有5块红布,心中顿时暖流奔涌。

“挂红”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,谁家要是头胎生了男孩,与其交情深厚的村民就要趁傍晚天亮悄悄地到其门前挂上5尺红布,以示贺喜,有单独去挂的,也有几个人凑份子买上好的布料去挂的。喜主收下红布后,自会揣摩出是谁来挂的,紧接着就要登门致谢,并约定孩子过“十二日”时,务必前去赴宴庆贺。吃过早饭,杨守泉开始造访几个挚友,向他们报喜,并问起“挂红”的事,很快找到4家,剩下这家,问了好多人,都说与己无关。他苦思冥想,就是揭不开这个谜底。蓦地,他想起了谭深。杨守泉与谭深一向不睦,原因出在父辈们身上。那年,谭深的父亲结识了一位南方商人,每年秋天到广州卖苹果,总能卖个好价钱。杨守泉的父亲与谭深的父亲关系不错,便将自家所产的苹果委托他拉到广州销售,谁知事与愿违,谭深的父亲归来后说那边行情不好,苹果滞销,当地气温又高,结果全部烂掉,血本无归。有人说姓谭的太鬼,十有八九花了昧良心的钱。杨守泉的父亲嘴上不说,心里却系了个“疙瘩”,见了谭深的父亲也不搭理。两位老人也都忧郁成疾,直到临死也未重归于好,这个“疙瘩”直到儿子这辈也没解开。

杨守泉是个性格开朗的人,暗自思忖,当真是谭深前来“挂红”,若不登门致谢,就太失礼了,于是便去了谭深家。谭深一见杨守泉来了,乐呵呵地说:“杨老弟,大哥给你贺喜啦。”杨守泉不由地一怔:“果然是你挂的‘红’?”谭深直言不讳:“你家添了孩子,我理应贺喜,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杨守泉说:“话虽这么说,但咱们两家多年不来往,你这么做可是将了我一军。”谭深说:“说来话长,我父亲临终时对我说过,当年贩那趟苹果确实赔得太惨了,不可避免地让人说三道四。上一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,咱们两家同喝一井水,要和睦相处。”杨守泉说:“大哥,你说到我心坎上啦。今天正式预约,我女儿过‘十二日’那天中午,一定到我家坐坐。”谭深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十二日”那天上午,杨守泉将岳母亲手做的红旗挂在门楼上,以示家中添丁。谭深践约而来,还携带一份厚礼,两家人握手言和。客人们接踵而来,乍一见谭深也在场,无不感到惊讶。大家拉了一会儿呱,见客人来齐,便按资排辈入席坐定。杨守泉特地把岳父和谭深分别安排在首席上。谭深再三推辞,怎奈盛情难却,只好客随主便。菜上四道,酒过数巡,杨守泉举杯敬酒:“我添了个女儿,承蒙大家赏脸,衷心感谢!”说罢与客人一一碰杯,大家一饮而尽。杨守泉最后说:“今天我尤为高兴的是,谭深大哥能主动为我‘挂红’贺喜,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。他这么做就像帮我拆除了一堵墙,我要敬他两杯。”客人们纷纷端起酒杯,气氛相当热烈,一直喝到下午,大家才尽兴而归。杨守泉本来酒量不大,因特别开心,喝得有些过量,出门送客时醉醺醺地提议:“从今往后,不管谁……谁家生孩子,咱们都要去‘挂红’,不仅祝愿……喜主日子红红火火,同时,也祝愿咱全村……红红火火!”客人们异口同声地响应:“坚决照办!”